

贵州人民出版社

青春寄语

春夏秋冬集

江曾培

贵 州 人 民 出 版 社

青 春 寄 语

春 夏 秋 冬 集

江 曾 培

责任编辑 张继泽
封面设计 石俊生
技术设计 荀新馨

春夏秋冬集

江曾培 编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

四川泸州市印刷厂排版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4.5印张 96千字

1984年2月第1版 1984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0

书号 3115·450 定价 0.36 元

目 录

“应知重理想”	(1)
“只姓‘社’”	(6)
关于出名, 说“出名”	(9)
工作的配角与生活的主角	(13)
关于天南海北和“天、南、海、北”的一席话	(16)
“时乎? 命乎?” 析	(21)
斩断“唯文凭论”的羁绊	(24)
不“移”不“淫”	(27)
“转”、“化”, 转化	(29)
“孟加拉虎”的随想	(32)
人的美丑说	(37)
不要礼教, 但要礼貌	(43)
谈友谊	(49)
斩断“江湖义气”的绳索	(52)
小议爱情的选择	(55)
从追逐“海落空”谈起	(60)
亲其亲	(64)
要讲职业道德	(67)

齐人故事今谈·····	(71)
看电影想起的·····	(74)
由“国骂”说开来·····	(77)
勿用小人之心·····	(82)
春节话“人情”·····	(84)
与人为善·····	(87)
于细微处见精神·····	(90)
春夏秋冬·····	(92)
普及马克思主义 A B C·····	(95)
拼命地“吃”个不停·····	(99)
一口一口地吃·····	(101)
优良的学风·····	(104)
阅读作品要有正确的思考·····	(108)
不要硬充其中的角色·····	(113)
艺术趣味谈·····	(117)
要有一柄坚毅的精神之剑·····	(121)
“时间是我的财产”·····	(125)
金字塔联想·····	(128)
名人不是“一举成名”的·····	(132)
可敬与可为·····	(135)
警惕“讹而新”·····	(137)
后 记·····	(141)

I

“应知重理想”

“应知重理想，更为世界谋。”这是陈毅同志《示儿女》一诗中的两句话。我认为，这是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他们的“儿女”——年青的一代最可宝贵的指“示”，要树立“为世界谋”的共产主义理想。

共产主义理想，是人类最伟大最崇高的理想。革命前辈和革命烈士奋发工作，艰苦奋斗，以至于抛头颅，洒鲜血，就是为了保卫它，实践它。夏明翰面对敌人的屠刀，讲的是：“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李大钊走上敌人的绞刑台，说的是：“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方志敏在敌人的囚房里，写下了：“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刘伯坚在敌人的监牢里，记下了：“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拚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共产主义理想，是革命前辈和革命先烈心中不灭的明灯，是他们生命闪闪发光的光源。作为他们的“儿女”和后代，从他们身上学习和继承的，最重要的正是：“应知重理想，更为世界谋。”

“重理想”，就是要象革命前辈和先烈一样，具有崇高

的人生目的。人活着为什么？为自己，还是为别人？为少数人谋，还是“为世界谋？”这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前者卑下，后者崇高。历史上一切信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哲学的人，都是渺小的；一切为多数人的利益而奋斗的人，都是高尚的。当人类进入了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只有以共产主义为理想的人，才是最崇高的。因为，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最合理、最美好的社会制度，它能使“工农齐解放”，过着最富裕最文明的生活，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和社会不平等，让每个人都真正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就是为人民的最大利益和社会的长足进步而奋斗。所以雷锋说：“一个人活着，就应该把毕生精力和整个生命，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共产主义全部献出。”为此，就应该象张思德那样“为人民服务”；象白求恩那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象赵春娥那样“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走到哪里把好事做到哪里，以至于象先烈们一样，“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由于党的长期教育，在青年中闪耀着共产主义理想光辉的人物，正愈来愈多。最近出现的舍身救人的大学生张华就是一个。这是可以告慰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但是，由于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由于十年内乱留下的遗毒，以致一些青年不是重理想，而是重实惠。他们热衷于追求个人和小家庭的利益，忙于经营自己的安乐窝。虽然，对此不可简单地一口否定，这其中的某些物质要求，也不能笼统地反对。共产主义原是作为一个要使每个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高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时代的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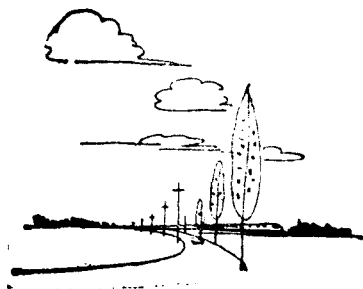
年，一心想的是个人“实惠”，脑子里就难于有别人、集体和国家的利益了，更谈不上“为世界谋”了。对他们来说，“理想就是有利就想，前途就是图的是钱”。这样，难免有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行为，严重的甚至会走向经济犯罪的道路。由此可见，光讲“实惠”不重“理想”，光讲“实”不讲“虚”是不行的。人无理想，不知其可也！当然，讲“实惠”，也可以说是一种“理想”，然而与高尚的共产主义理想比较，它打上的是卑劣和渺小的印记。陈毅同志在《示儿女》中谆谆告诫我们：“我要为众人，营私以为羞”。

“重理想”，就是要象革命前辈和先烈一样，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共产主义是人类空前壮丽的事业，也是人类空前艰巨的事业。它的实现，需要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但是不论斗争多么艰苦，道路多么曲折，共产主义是一定要实现的，因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列宁曾经说过：“马克思丝毫不想制造乌托邦，不想凭空猜测无法知道的事情。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的问题，正象自然科学家提出某一新的生物物种变种的发展问题一样，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这一变种是怎样产生以及朝着哪个方向演变的。”事实正是这样。自从1847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立、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开始，共产主义作为一种运动就产生了，并向着胜利的方向日益发展壮大。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的胜利，都是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虽然这些胜利离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还有很大的距离，犹如万里长征的第一步、第二步，但它毕竟是一步、二步，革命者正是在这一步又一步的前进

中，达到自己的目的。目前，有些青年觉得“共产主义是一支遥远的歌”，“渺茫得很”。这一方面，说明他们对“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缺乏信念；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们不了解共产主义也是一种运动。作为一种运动，共产主义早已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前面说到的张思德、白求恩、雷锋、赵春娥以及众多的革命前辈和革命先烈们，他们的行为不都是闪耀着共产主义的光辉吗？社会上涌现的那些急公好义，助人为乐，不计报酬，义务劳动的事迹，不都是共产主义的新芽吗？共产主义并不“渺茫”。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报告中指出：“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包含着共产主义，都离不开共产主义”。因此，从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实现来说，共产主义是一支“遥远的歌”；但作为实现这一社会制度而进行的运动来说，它又是一支“现实的歌”。青年们“重理想”，就是要在任何时候都不模糊和动摇自己的共产主义信念。当然，目前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阶段，不能超越历史条件实行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行的政策，但在生活中要坚持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为指导，在心中树立起共产主义的旗帜，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只有这样，才会心明眼亮，高瞻远瞩，不为香风所迷，不为曲折所撼，把共产主义事业推向前进，把共产主义旗帜撑到最后的胜利。

陈毅同志在《示儿女》一诗的最后，语重心长地写道：“接班望汝等，及早作划筹。天地最有情，少年莫浪投。”

青年们要“接班”，最重要的“划筹”，就是要在自己的心中升起共产主义的旗帜。这旗帜给我们以方向，给我们以力量，让我们的青春燃烧，让我们的生命闪光。对这“最有情”的关怀，我们要切实地实践它，千万“莫浪投”呵！



“只 姓 ‘社’ ”

1933年，肖伯纳与鲁迅相会于上海。这两位文豪谈到世界局势和英国、中国前途问题时，肖伯纳对鲁迅说：“你以为我真姓肖吗？不是。我是姓‘费’。”鲁迅说：“以我看来，你既姓肖，又姓费（当时肖伯纳是费边社的首脑之一），但我相信你终究只会姓肖，不会姓费的，因为费边主义在英国也好或在别的国家也好都不会有出路的。”肖伯纳点头微笑，接着他反问鲁迅：“我听说你姓周又姓鲁，是不是？”鲁迅笑着回答：“是啊！我姓周，名字叫周树人，又姓鲁，名字叫鲁迅。可我还有第三个姓，那就是‘社’，名字叫社会主义。我同你刚相反的，你将来姓肖不姓费，而我将来呢，可以不姓周和鲁，而只姓‘社’，因为社会主义不但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一定会胜利的。”

这，表明着鲁迅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

鲁迅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他生活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从小就产生了忧国忧民的思想。他毅然抛弃了当时一般读书人以科举进身的道路，改入新学，从学水师，学矿路，学医学，以至最后学文学，都是为了挽救民族和国家的危亡。他几经“彷徨”，才得出只有社会主义能救中国的伟大结论。他表示自己“只姓‘社’”，决不是一时的心血来

潮，而是几十年艰辛地“上下而求索”的结果。

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有大量的爱国者，怀着一腔救国的热血，向西方寻求真理。可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这时，中国共产党人终于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用来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鲁迅，正是在与“先驱者取一致步伐”的战斗中，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由于这样，鲁迅的爱国主义，就是一种最后达到共产主义高度的爱国主义，从而使他成为一个“空前的民族英雄”，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魂”。

鲁迅这种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说明，爱国，必须同时爱社会主义。当前，爱国，也就是要爱社会主义的祖国。爱国者应当象鲁迅那样，“只姓‘社’”。然而，现在却有人怀疑起鲁迅几十年“上下而求索”得出的结论，希图改“姓”换“氏”。然而，这个“姓”是千万改不得的。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它不仅是鲁迅，也是中国各族人民从一百多年来的切身经验中得出的结论，也是建国三十二年最基本的历史经验。妄图转回头来再走西方的路，那是无论如何也走不通的。

有这样一个材料：一九八一年四月，在美国举行了一次由我国大陆去的学者和台湾去的学者同时出席的“中国经济

发展问题”的学术讨论会。台湾一学者在会上说台湾经济如何如何好，大陆如果按台湾那么办，就好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陈立教授引用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舒尔茨教授的意见，说台湾应和大陆的某些省份比。陈立教授提出，是否和上海比？那么，按美国中央情报局统计的数字，一九七七年台湾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为一千五百美元，而上海已超过二千五百美元。何况，台湾得到的美援平均每人一百五十美元，如果大陆十亿人按此比例，需要一千四百多亿美元的外援，谁能负担得起？说得与会者，包括台湾留美学生都认为中国经济有希望，前途光明。这表明，尽管我们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初级阶段，还不完善，但在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以后，它的巨大的优越性必将越来越充分地显现出来，“社会主义不但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一定会胜利的”。肖伯纳虽然后来没有完全摆脱“费氏”影响，但是明显地靠拢“姓‘社’的”了。今天，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之中，更应该象鲁迅那样，自觉地坚定地“只姓‘社’”了。



关于“出名”，说“出名”

大学生冯大兴曾经是一个学习“尖子”，由于追名逐利，个人主义恶性膨胀，最后沦为行窃杀人犯，被判处死刑。他的毁灭，从反面教育了大家，青年一定要努力改造世界观，不能放任个人主义的毒菌侵袭自己。可是，有的青年却认为“冯大兴尽管毁了，可他的名字却为众人所知晓，不也是一种骄傲吗？”

这种议论是冷酷得有点令人心寒的。对杀人越货犯不义愤，不斥责，却羡慕其由此可以出名，这是连最起码的是非观、荣誉观都没有了，最起码的正义感、人情味都没有了。它表明说这样话的人的灵魂，也被个人主义毒菌吞噬了，不可不察！

我们知道，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追求的，一个叫名，一个叫利。这里讲的是名。我国晋朝的桓温，由于他“阴蓄不臣之志”，讲过一句话：“既不能流芳后世，也不足复遗臭万载耶！”自此，一切极端个人主义的逐名者，都将它奉为主臬。他们运用各种各样的卑劣手法，不惜践踏别人的生命和财产，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以达到自己“出人头地”的目的。在中国历史上，就留下了秦桧、李鸿章、袁世凯以至林彪、江青这一串名字。他们确是出名了，但这种“遗

臭万载”的臭名，受到人民世代代的呵斥。你看，在杭州西湖岳坟的对面，跪着反剪双手的秦桧夫妇铁像，哪一天不受到游人的唾骂？就连铸像的白铁，面对“有幸埋忠骨”的青山，也有“无辜铸佞臣”之憾。这些罪恶的名字是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为一切正直的人们所不耻。冯大兴的名气，当然还没有秦桧之流那么大，但他因行窃杀人而使名字为众人所知晓，在本质上一样是罪恶、耻辱的标记。作为社会主义时代的青年，怎能以这种出名为“一种骄傲”呢？这不是是非不分、荣辱颠倒吗？这不是正义丧失、人情泯灭吗？

在西方，有一个受到人们唾骂的名字，叫做艾罗斯特拉特。他是古代埃菲斯城的一个居民，为了自己出名，放火烧了埃菲斯城中的稀世珍品——狄安娜神殿。自此，艾罗斯特拉特就成为一个专用的贬词，用来指责那些不择手段追求出名的人。当然，艾罗斯特拉特也有他的继承者，因而也有人想易贬为褒，翻这个案。法国作家萨特在以《艾罗斯特拉特》为题的一篇小说中，描写过一个人物，以疯狂的虐待妓女和枪杀他人的行动，以求名扬四海，成为一个当代的艾罗斯特拉特。他为什么这样做呢？有这样一段对白：“我想，您一定很想知道一个不爱人类的人是怎样的吧。这个人就是我，我对人类的爱只达到那么微小的程度，以致过一会儿我就要杀掉半打人。”这就是说，不爱人类，或者说仇恨人类，以残害别人为手段，求自己的名字“永垂不朽”。这是一种多么肮脏而残酷的人生哲学呵！冯大兴的所谓名声，本质上也是艾罗斯特拉特式的。对这样遗臭万年的名声，一切正直的

人都会嗤之以鼻，今天的青年更不应该引为什么“骄傲”了。

引为人类骄傲的名字是有的。那不是行窃杀人犯冯大兴，而是与冯大兴之类蠹贼作斗争的人。不是秦桧，而是岳飞。不是李鸿章，而是邓世昌。不是袁世凯，而是孙中山。不是林彪、江青，而是张志新、遇罗克。不是制造劫机事件的那几个反革命小丑，而是杨继业那样的反劫机的英雄。引起人类骄傲的名字还有许多，但都不是毁灭稀世珍宝的艾罗斯特拉特之流，而是为人类增添物质、精神财富的志士仁人：屈原、高尔基、鲁迅、爱因斯坦、张衡、李时珍、居里夫人……总之，是有益于人民的人，是把自己的聪明才智乃至鲜血、生命献给人民的人。青年人爱名，就应当爱这样流芳百世的名。古话说：“高山仰止，心向往之。”以这样的名，作为自己学习追求的目标，就可以促进自己奋发向上，力争为祖国和人民作出更好、更多的贡献。青年人求名，就应当求这样的名。一个人越是求这样的名，就越会鄙视艾罗斯特拉特式的求名。因为，前者以利他精神为核心，后者以利己思想为灵魂，两者犹如冰炭之不容！青年人上进心强，有着出名的欲望，一般并无可厚非，但是，要求出什么名，怎样出名，却贯串着两种思想、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不可不察！

需要补充的是，那些真正为革命事业作出贡献而出名的人，又往往有一种甘当无名英雄的精神，他们并不是为了出名才去“贡献”的。王杰同志说得好：“虚荣的人注视着自

己的名字；光荣的人注视着祖国的事业！”因而，在为革命作出贡献的英雄模范当中，由于种种原因，有的人流芳百世了，有的人却一直是无名英雄。甚至可以说，在革命的长河中，无名英雄是远远多于有名英雄的。然而，这些无名英雄并不因“无名”而遗憾，相反却觉得“当一名无名英雄是最光荣的。”因为他们所以是英雄，就因为他们注视的是革命事业，而不是自己的名字。因此，有些有强烈出名欲的人，虽然不以冯大兴式的“出名”为“骄傲”，但却往往因“无名”而烦恼，这实际上也就孕育着非英雄的种子——个人主义毒素。从这个意义上说，出名欲是不该强烈的。对社会主义时代的青年来说，应当具有不为名，不为利，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的精神。这样，才能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